

[DOI] 10.19653/j.cnki.dbcjdxxb.2024.01.001

[引用格式] 夏杰长,张雅俊.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新局面[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4(1):3-13.

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新局面

夏杰长¹, 张雅俊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6;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商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内需是国民经济总需求的主体, 是大国经济最根本的发展动力。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与动力, 投资是实现消费需求工具与途径, 消费和投资是驱动内需的双轮, 两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 扩大内需必须坚持消费和投资共同发力。从消费与投资的关系看, 投资是实现消费需求的工具与途径, 投资的适度增长和投资结构的优化能够更好地满足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的消费需求, 促进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率增长;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与动力, 消费提质扩容和新消费需求涌现等变化会引起生产和供给变化, 进而影响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为促进内需潜力充分释放, 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形成促消费稳投资的合力, 转向依靠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 推进消费和投资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 疏通消费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与制约消费实现的堵点, 破除投资进入消费领域的障碍和隐形壁垒, 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新局面。

关键词: 消费; 投资; 内需; 经济增长;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96(2024)01-0003-11

一、引言

内需是国民经济总需求的主体, 是大国经济最根本的发展动力。2023年, 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促消费、稳投资的政策举措组合拳, 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内需作为“助推器”“稳定剂”作用凸显, 潜力加速释放。2023年前三季度, 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113.0%, 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3.2%, 有效对冲了外需收缩的压力^[1]。消费是内需体系的重要支撑,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2023年7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提出“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

收稿日期: 2023-12-2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生产网络视角下服务业技术进步影响因素、机制及路径优化研究”(72073139)

作者简介: 夏杰长(1964-), 男, 湖南新宁人, 研究员,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服务经济、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E-mail: xiajch@cass.org.cn

张雅俊(1996-), 男, 四川乐山,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旅游管理与服务经济研究。E-mail: zyj1130_per@163.com

力”^[2]。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对内需的定位也由“基本动力”上升为“主动力”^[3]，强调了扩大内需的关键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占比远高于消费。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具有明显的依靠投资和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小国特征^[4]，稳定的内生动力不足。受此影响，中国相关政策与机构设置紧密围绕投资展开，形成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导致中国投资率长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刘勇政等^[5]探讨了分税制对投资的激励作用，尝试解释中国高投资率之谜。张中华^[6]分析了中国投资率的演变趋势，提出产业转型、城市化进程、消费供给市场化和消费供给结构、资源禀赋、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政府行为等短期和长期因素会影响投资率和消费率。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是肯定的，但是现阶段投资机会趋于减少，投资增速持续下降，投资对经济的驱动作用明显减弱。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适应发展阶段的形势变化，需要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缓解政府、房地产和需求管理驱动导致的中国消费与投资失衡^[4]。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偏低的原因众多，包括由投资主导的高投资低消费发展模式^[7]、高房价导致的高储蓄^[8]、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9]、收入差距扩大^[10]、资产流动性较弱^[11]等。学术界关于投资对消费会产生挤出效应还是挤入效应并未达成一致结论。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投资会挤占消费。齐红倩等^[12]研究了总投资和总消费的关系，发现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认为中国存在依赖投资驱动经济增长而尚未释放消费驱动潜力的问题。刘元春和丁洋^[13]进一步区分了投资的具体领域，发现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会挤出总消费，但是企业投资能有效促进相关商品消费，提升居民总消费率。大量学者提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应逐渐由投资过渡到消费，强调消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王微和王念^[14]认为，中国消费需求呈现出规模扩张、结构升级和创新转型等新特征，内需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发生了改变，逐渐由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曹远征^[15]认为，宏观调控应从扩大投资转向以发放消费券或补贴的方式扩大消费，以改善当前消费不足的现状。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消费和投资是紧密联系的，是驱动内需的双轮，因而不能单纯就消费刺激消费，就投资扩大投资。没有投资的支撑，仅依靠消费是难以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终消费需求无法实现，会导致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问题。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是加快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16]。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未来必须在扩大内需战略的指导下，增强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推动消费复苏升级和有效投资适度增长，形成更高层次的动态平衡，使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本文可能的学术贡献在于，厘清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明晰有效投资满足更高水平的消费需求、消费提质扩容带动有效投资的原理，探索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新局面的对策思路。

二、扩大内需必须坚持消费和投资共同发力

全球经济面临持续下行的风险，出口难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成为近年的热点和争论话题，这蕴含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命题。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与动力，投资是实现消费需求的工具与途径，两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扩大内需必须坚持消费和投资共同发力。

(一) 经济增长：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

1. 投资拉动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都强调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投资具有双重作用，在短期能够刺激经济需求，形成固定资产，从长期看则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飞速推进，依靠基础设施、生产设备和房地产等投资显著驱动经济增长，形成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然而，中国投资率长期偏高，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储蓄率也高于日本、韩国这类高储蓄率亚洲国家，高投资和高储蓄导致消费率较低，即中国经济社会呈现出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的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12年起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资本形成率持续下降，202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9%，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5.1%；2023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3.8%，增速进一步下降。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推进和基础设施投资相对饱和，基础设施等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有限，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对此，刘元春^[17]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症结在于内需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其核心在于消费不足而非投资不足。投资的本质特性在当期体现为需求，而在形成固定资产后则演变为供给，如果过于依赖投资扩大内需，当出口需求不足时，就会产生消费不足的经济病。除了消费需求规模的制约，资本积累的深化、劳动力成本增加和土地供给紧张等也是近年来中国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6]。由此，诸多学者认为中国内需扩大和经济增长应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余永定^[18]认为，消费只能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前提下才能拉动经济增长，消费本身无法增加经济增长的潜力，因而在促进消费的同时，应意识到支持技术创新、产业链重塑和医疗养老设施建设等基础设施投资才是破除中国经济持续下行趋势的主要选择。

2. 消费拉动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与动力，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是社会再生产的最终环节。加速恢复和刺激消费以释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需求有助于畅通社会再生产和国内循环。然而，中国消费率长期偏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潜力尚未充分释放。第一，从生产角度来看，总需求不足表现为产能相对过剩而消费不足。党的十八大以来，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成为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主要问题之一。这其中既与经济周期性和产业转型等宏观因素的影响有关，也与中国长期以来以出口为导向、依靠外需拉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因此，消费的意义凸显。提升有效需求，以有效需求拉动有效供给，能够使供给和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平衡。基于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这一契合当前和未来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将成为推动消费恢复和消费升级的重要指导。第二，从消费角度来看，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未来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释放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潜力，提高消费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一直偏低，而且呈现出长期走低趋势。1978—2003年，中国最终消费率长期稳定在60%—70%的水平（除1993年和1994年外），2004年下降至55.4%，2010年下降至49.3%。尽管中国最终消费率从2011年开始逐渐回升，2022年达到53.2%，但是一直没有突破56.0%。中国居民消费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1.0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8%，同比下降32.6个百分点。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外需明显回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牵引和拉动作用需要进一步释放。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19]。在新的发展阶段，消费需求正加速向个性化和品质化升级。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创新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的供给体系，优化消费实现渠道和平台，释放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

潜力。

（二）投资、消费与扩大内需

从支出法核算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是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三种需求也常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等式为： $GDP = C + I + G + (X - M)$ 。其中，C为消费支出，I为投资支出，G为政府支出，可以进一步分为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 $(X - M)$ 为净出口，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了三大需求，而消费和投资属于内需。基于比较静态和封闭经济条件，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居民收入水平一定时，增加投资会用于消费的收入相应减少。在现实中，消费和投资联系紧密、耦合协同。Samuelson^[20]基于乘数和加速数交织作用的经济周期理论证明消费和投资是相互影响的，追加投资通过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需求增加，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又吸引新的投资。闫芷毓等^[21]认为，基础设施投资能够通过增加当期收入和未来预期收入两个渠道促进居民消费，即基础设施投资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入效应。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也会引致原发式技术进步从而促进消费^[22]。消费和投资均能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投资才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因而经济增长理论更强调投资的作用。实际上消费和投资存在“消费增加—去库存—生产增加—新的投资”和“追加投资—产值增加—消费增加—新的投资”的互动关系，投资的最终目的还是消费，经济无法长期脱离消费仅依靠投资实现持续增长^[23]。

消费和投资都属于内需的一部分，都能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消费和投资会相互影响。因此，经济增长是由消费拉动还是投资拉动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是要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新局面。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传统的规模扩张型增长道路亟须加快向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转型的步伐。消费和投资作为总需求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为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需求、切实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需要加速形成促消费稳投资合力，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有效投资规模，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促进内需潜力充分释放。

三、有效投资满足更高水平的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从消费与投资的关系看，投资的适度增长和投资结构的优化能够更好地满足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率增长。

（一）投资是实现消费需求的工具和途径

如何提振中国消费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以往研究多基于居民收入水平、收入分配结构、闲暇时间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探讨如何促进消费，对投资的关注相对较少^[13]。然而，投资是实现消费需求的工具和途径，有效的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会显著影响消费。消费需求增长和结构优化的实现需要与之匹配的生产能力、生产效率和生产结构。扩大生产力需要保持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并追加新的投资，提升生产效率需要以投资支撑技术创新和应用，优化生产结构需要调整投资方向和内容，即消费需求增长和结构优化的实现需要追加新投资和调整投资结构以保持生产与消费的适配。政府在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促进了沿线区域性消费和汽车等特定商品的全国性消费。企业对生产设备、技术和产品等投入研发资金，优化产品质量和性能，促进相关产品消费的同时对总消费产生挤入效应。

投资除了能够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和结构优化，还能创造和引领新的消费需求。一方面，投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产生新的工作岗位，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投资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创造和引领新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规模扩大和提质升级。

消费会受到现有生产结构和产品供给的影响,而这是往期投资的结果,未来的生产结构和产品供给则由当期投资结构决定。增加投资规模能够提升未来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优化投资结构能够影响未来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创造新的消费场景等。

当前,中国面临着公共服务投资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足的困境,有效供给不足导致这部分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制约了相关消费需求的实现。中国消费需求的宏观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随着人民收入的稳步提升,优质医疗服务、教育公平等更高品质的需求快速增长。但受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配套政策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中国部分地区的教育、医疗、养老和体育等生活服务业发展和投资仍不充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民间资本进入不足、市场化程度偏低,严重滞后于居民对这类服务的刚性需求。投资没有匹配消费需求增长与结构优化的变化,阻碍了消费需求实现。

(二)有效投资能够满足消费提质扩容需求

投资能够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设备更新升级和关键生产线优化改造等途径支持消费升级和新消费的实现。一方面,有效投资能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质量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每一次质量领域的变革创新都促进了生产技术进步、提升了人民生活质量。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国民收入提高,中国居民的需求结构将向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方向转变。如果有效投资不足、供给结构调整迟缓,就会导致产出与需求结构不匹配,出现低端产品和服务过剩与高端产品和服务不足并存的状况。有效供给不足使得居民消费新需求无法完全被满足,进而抑制了消费升级。比如,当前阶段消费者的核心诉求逐渐从物向人转移。以往的消费模式中消费者习惯性地被动接受既定消费品的供给,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借助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等,消费者可以主动地共同参与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中,直接与生产者互动,而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的价值释放和技术创新离不开投资的支持。另一方面,有效投资能够满足新消费需求。电子商务、直播经济和在线文娱等数字消费、新型消费快速发展,大量消费客体通过数据和数字技术映射到数字空间,即消费客体以数字形式呈现以供消费者消费和体验。比如,传统的线下教育、线下音乐会投射到虚拟数字空间,消费者可以选择以数字形式进行消费,获得全新的数字化消费体验。通过数字化呈现方式,部分传统服务半径几近无限扩大,显著扩大了消费群体规模和消费容量,优化了消费体验和质量。数字消费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能够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释放更大的消费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对新消费的需求。

投资不足和投资低效引发的有效供给不足会导致大量需求外溢。投资在形成固定资产后会演变为供给,如果有效供给不足,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满足,中高端消费需求将向外溢出,造成消费能力外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扩大的内需必须是有效需求,是满足人民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是可持续的需求。投资需要满足有效需求,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上发挥更大作用,提升供给结构对有效需求的适配性,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等增加优质、中高端消费供给,满足提质扩容和持续创新的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

四、消费提质扩容是带动有效投资的重要力量

(一)准确把握消费发展变化新趋势和新特征

中国消费持续提质扩容,表现出一系列新趋势和新特征,包括以数字消费为代表的新型消费持续涌现、服务消费占比快速提升、绿色消费场景稳步扩大、中高端消费加速回流等。准确把握

消费发展变化新趋势,有助于积极发掘新的消费增长点,加速形成消费增长新模式,以消费带动有效投资。

1.新型消费拓展消费新空间

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等新技术、线上线下融合等新商业模式显著拓展了消费空间,基于社交网络和新媒介的数字消费等新型消费需求显著增长。中国已连续10年保持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地位,截至2022年6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4.4%,其中网购用户占比超过80.0%。2022年,全国网上零售额为13.8万亿元,同比增长4.0%，“互联网+服务”等在线服务成为消费恢复性增长的新空间^[24]。与传统消费相比,新消费具有深度融合性、配置高效性、发展持续性和循环畅通性等特征,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动能。数字消费是传统消费在数字空间的扩展和延伸,代表了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的变化,成为建设数字中国的强劲驱动力^[25]。数字技术塑造了新的虚拟消费空间,打破了物理空间的时空限制,丰富了消费供给,推动消费内容、行为和空间向线上转移,使不受时空约束的消费成为可能。“云旅游”“云赏剧”“云看展”等也成为休闲娱乐消费的新时尚。新消费模式的崛起,带来消费市场的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新消费模式的涵盖范围越来越广,长尾效应持续释放,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促进消费市场转型升级,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2.服务消费成为消费扩容新引擎

从消费类型来看,服务消费多为发展消费和享受消费,能有效满足人民放松身心、提升文化素养、提高学习专业技能和积累人力资本等需求。近年来,中国服务消费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增速高于人均消费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2013年至2023年上半年,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重由39.7%上升至44.5%^[26]。2023年8月,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服务零售额数据,体现了居民消费结构向服务消费转变的趋势^[27]。中国服务消费规模持续扩大、占比加速提升,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对象、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和扩大内需的关键抓手。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时,居民服务消费需求将大幅增加,并逐渐成为主导性消费对象。2022年,中国人均GDP为1.3万美元,迈入服务消费快速发展的新阶段^[28],消费的主要对象正加速从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转换,文化旅游、医疗养老、体育保健和教育等服务消费加速提质扩容。

3.绿色消费释放消费新潜力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低碳环保技术进步的加快,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显著提高,绿色消费理念日益转变为绿色生活方式,吃穿住行等领域分层次多样性的绿色消费需求逐步形成并加快释放。近年来,新能源汽车消费快速升温体现了人民对绿色消费的青睐。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688.7万辆,同比增长93.4%,市场渗透率超过25%^[29]。绿色商品市场销售增长较快,特别是随着绿色节能家电下乡、绿色建材下乡和新能源汽车下乡等绿色消费促销活动在农村广泛开展,绿色消费下沉特征更趋明显。随着技术研发和模式创新的持续推进,绿色低碳消费将走向更多场景,更深入地融入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4.中高端消费回流激发消费新活力

近年来,在国家出台免税消费促进政策、下调奢侈品相关税率、国内消费场景不断完善以及疫情导致出境消费受阻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境外中高端消费逐渐向境内回流。根据《2022中国奢侈品报告》,2016—2018年,中国境外奢侈品消费占全部奢侈品消费的比重为75%左右。2019—2022年,这一比重从68%下降到43%,表明大量中高端消费回流国内。中高端消费大量回流,不仅丰富了国内市场,带动了相关配套服务,还将不断推动国产品牌做优做强,提升中国品牌的

国际影响力。以品牌和品质为核心的中高端消费具备强大的时尚引领和消费实现功能,其承载的符号价值能够吸引更加注重消费品质的群体,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中国的品牌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

(二) 消费提质扩容引致投资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

消费提质扩容和新消费需求涌现等规模和结构变化会引起生产和供给变化,进而影响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6]。消费需求提质扩容会激励相关主体追加投资、扩大生产,形成消费提质扩容促进投资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的逻辑链条^[16]。从最终环节看,如果消费需求的规模和结构保持稳定,那么社会只需要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固定资产日常更新,此时增加投资将导致生产能力溢出、消费品过剩。这表明投资所形成的生产结构需要与消费需求结构匹配,以减轻生产能力的结构性过剩。本质上消费高质量增长不再是单纯的数量增长,而是有效需求的满足和更高效率的增长。推动消费复苏和消费升级既要寻求消费总量的增加,以发挥量的有效增长,更要注重消费结构升级,优化投资结构,加强消费型投资,实现消费引导投资、投资适应消费的良好互促新局面。

现阶段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新消费需求持续涌现。比如,数字消费作为数字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新消费客体,数字音乐、数字影视和数字游戏等多元数字产品极大丰富了消费供给,满足了数字消费主体的消费需求。通过文旅消费,消费者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和愉悦体验,主体素质在消费中得到跃升和发展。受到数字消费、文旅消费等消费需求提质扩容的影响,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将消费和投资视为有机整体,以有效投资提升供给和需求间的匹配度,能够畅通投资—消费循环,以消费提质扩容为导向,引导消费基础设施和产业链投资,着力破解传统产能过剩与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五、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新局面的对策思路

着力扩大内需,促进内需潜力释放、以内需驱动经济增长亟须形成促消费稳投资合力,转向依靠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推进消费和投资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疏通消费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制约消费实现的堵点,破除投资进入消费领域的障碍和隐形壁垒,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新局面。

(一) 促进消费提质扩容,以新消费和新场景释放消费活力

2022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作为2023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力,奋力推进消费复苏与升级,全面助力扩大内需战略实施。第一,拓展消费业态,创新消费场景。数字经济有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畅通经济内循环。为此,要加快数字经济赋能消费业态和消费场景创新,推动消费提质扩容增效。以科技智能改造传统商业,引领新零售发展。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对实体商业改造升级,发展智慧超市、智慧商店和智慧餐厅等新零售业态。发挥平台经济促消费的关键作用,提升消费体验感。完善直播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培育网红商品、直播达人、“小而美”网络潮牌和国货品牌,繁荣居家“宅消费”等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以数字化引导服务供给规范化、标准化,提高服务供给水平。引导各类电商平台为服务零售中小商户提供营销、流量和数字化工具等服务,提高服务零售行业整体供给水平。第二,鼓励新消费,增强消费活力。以医疗养老、文化体育、休闲娱乐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和以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为代表的新消费,是当下以及未来消费的新空间和增长点。中国要深刻把握消费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挖掘各类特色资源,不断培育消费新热点,增强消费

活力。推动服务消费与消费场域深度融合，优化消费环境和氛围^[30]。培育文旅消费新热点，鼓励各地政府制定年度的文旅IP推广计划，将文旅IP创建列入各类文旅示范区建设指标。挖掘休闲需求潜力，鼓励体育娱乐消费。加快足球、篮球等职业化改革步伐，推动职业联赛等体育赛事的市场化运作，以“村BA”“村超”等网红赛事为契机，筹划组织举办各类体育邀请赛。适当简化体育赛事、演唱会的审批流程，促使更多的文体活动及时落地实施，在释放国民文体消费潜力的同时，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民族凝聚力。鼓励绿色消费、共享消费和公共消费，培养绿色消费习惯。组织开展家居焕新活动，推进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加快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对销售低碳、环保等绿色产品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积极引导培养全民绿色消费习惯和意识。

（二）统筹短期与长期调控机制，实现居民收入长期稳定增长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关键在于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减少不确定性，增强安全感。第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持投资适度增长。促进消费的根本举措在于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398元，同比实际增长5.9%^[1]。政府部门保持投资适度增长，恢复居民对未来就业和收入的稳定预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低收入群体规模，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第二，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稳定经营主体。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减轻企业发展负担，实施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支持计划和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加快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就业权益保障政策，提高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者的经营性收入。第三，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消除消费后顾之忧。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加快发展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层次性和丰富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多样化社会保障需求。

（三）强化对消费环境的投资，优化消费条件和投资机制

改善消费条件和环境、增强消费后劲和投资信心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之一。消费条件除了与居民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外，还取决于消费环境和消费体验感。消费环境不佳会制约居民的消费意愿。因此，要加强对消费环境的投资，不断改善消费条件和完善投资机制，增强消费场景与消费需求的适配性。第一，加大投资力度，着力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强化存量片区改造与支持消费新场景发展的硬件功能衔接，加大对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的财政金融扶持力度和民间资本吸引力。第二，加快培育多层次消费中心。提质扩容国际和全国性消费中心建设，大力培育区域性消费中心，加快建设地方特色消费中心，形成多层次消费中心空间格局。第三，大力发展免税经济，完善免税消费场景，鼓励线上和线下免税消费业态同步发展，有效促进中高端消费回流。第四，强化产品质量监管机制。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产品和服务质量监管体系，完善各行业产品和服务质量监督标准体系，切实改善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构筑安全放心优质的消费环境。关注消费者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规范电商等平台合规收集和使用用户数据。第五，持续完善投融资机制。完善资本市场的功能，发挥资本市场对消费和投资的促进作用。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和消费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消费基础设施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四）保持有效投资规模适度增长，动态优化投资结构

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等带动全社会投资，是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有效工具。第一，保持有效投资规模适度增长，带动全社会投资。地方政府投资在驱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相较而言民间投资不足,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2023年1—5月增速由正转负。民间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来源,是稳增长、稳就业、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未来需要增强民间投资预期和投资信心,以民间投资促进有效投资规模适度增加。民间投资能促进全社会投资增长和民营经济发展,稳定并增加就业,提升全社会投资效率和质量。2012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4.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56.5%;2022年,其增速大幅跌落至0.9%,占比下降至54.2%。因此,需要深化改革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强化民间投资预期和信心,优化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工作,充分释放民间投资活力,扩大有效投资规模。除了民间投资,外资也是重要的投资来源,因而积极合理利用外资是促进投资规模增长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由于产业升级和贸易投资政策等影响,外资企业和投资撤离趋势明显,对中国供给结构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应基于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实施积极的外资利用和吸引政策,打造优质的营商环境。第二,动态优化投资结构。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等日趋完善,传统的部分热点投资领域相对饱和,通过投资该领域以消除消费限制、促进消费实现的效应将会越来越有限,而对软件、数字基建等新兴领域进行投资将更具重要意义,投资结构对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亦将进一步强化。投资会形成资本积累并进一步产生新的供给能力,合理的投资结构能够有效缓解生产过剩问题。因此,应基于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的逻辑,引导投资进入更高端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根据消费结构变化动态优化投资结构,支持消费提质扩容和新消费需求的实现。创新是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良性发展的关键,也是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支撑。因此,还应加强技术和科技创新投资,优化生产设备、技术、工艺和产品,满足不断涌现的新消费需求。

(五) 促进农村消费和农村投资,拓展内需新空间

农村具有巨大的消费和投资潜力,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阵地。农村消费是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中国农村消费增长潜力大而投资不足,因而要用好农村广阔的市场空间,通过创新、扩容充分释放农村消费和投资潜力,促进下乡返乡群体消费和投资。第一,打通制约农村消费潜力释放的主要堵点。健全农业增收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农民生存成本,保障农民有钱消费、敢于消费。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创造丰富优质的消费场景,使农民有场景可以消费。弥补农村服务消费供给短板,加速完善农村养老、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休闲度假消费。支持城市物流渠道、品牌和平台企业等下沉农村市场,丰富农村的农家乐聚会、乡村生态游、房车度假等中高端休闲度假消费供给,激发农村消费活力。鼓励绿色消费、智能消费下乡。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予以适当补贴。开展绿色建材下乡活动,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绿色建材消费予以适当补贴或贷款贴息。第二,破除限制农村投资尤其是社会资本投资的主要堵点。稳定相关涉农政策预期,完善农村产权保护机制。当前所有者难以在农业生产设备和生物资产上设置抵押权,难以通过资产抵押获得融资^[31],应该加速培育农村要素市场,缓解农业资产抵押难、农业生产者融资难的现状。加大对农村的投资,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大力完善农村消费基础设施,推进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加强乡村物流对城乡生产与消费的衔接。支持对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三农产业投资。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点建设,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配送体系。改造升级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和农村新型便民商店等,丰富农村消费场景。推进城中村改造,带动基建等投资,优化城中村面貌和基础公共服务供给,激发城中村周边居民的消费潜力。

参考文献:

- [1] 中国政府网. 前三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到 113%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EB/OL].(2023-12-11)[2023-12-20].https://www.gov.cn/govweb/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19517.htm.
- [2] 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EB/OL].(2023-07-31)[2023-12-15].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7/content_6895600.htm.
- [3] 新华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3-12-12)[2023-12-19].<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7284952/7123550>.
- [4] 张志敏, 李娟娟. 中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表征、路径依赖与供给侧改革[J]. 宏观经济研究, 2017(9): 3-13.
- [5] 刘勇政, 吕冰洋, 李岩. 中国高投资率之谜: 分税制的激励作用[J]. 经济研究, 2021, 56(3): 65-82.
- [6] 张中华. 论投资与消费的协调高质量发展[J]. 宏观经济研究, 2023(9): 4-14.
- [7] FUNASHIMA Y, OHTSUKA Y. Spatial crowding-out and crowding-in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the private sector in Japan[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9, 75(4): 35-48.
- [8] CHAMON M D, PRASAD E S. 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0, 2(1): 93-130.
- [9] 赵坚毅, 徐丽艳, 戴李元. 中国的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与影响分析[J]. 经济学家, 2011(9): 13-19.
- [10] FENG J, HE L, SATO H. Public pension and household saving: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1, 39(4): 470-485.
- [11] JAPPELLI T, PISTAFERRI L. Fiscal policy and MPC heterogeneity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4, 6(4): 107-136.
- [12] 齐红倩, 刘岩, 黄宝敏. 我国居民消费、投资与就业变动趋势及政策选择[J]. 经济问题探索, 2018(8): 9-17.
- [13] 刘元春, 丁洋. 投资对消费影响的比较分析[J]. 财贸经济, 2021, 42(10): 5-20.
- [14] 王微, 王念.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J]. 旗帜, 2022(4): 60-61.
- [15] 曹远征. 厘清中国基建投资的三个关键问题[J]. 企业观察家, 2022(2): 58-63.
- [16] 董艳玲. 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N]. 光明日报, 2023-12-19(11).
- [17] 刘元春. 全面构建消费与投资相协调的扩内需方案[J]. 经济研究参考, 2023(1): 5-7.
- [18] 余永定. 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几点思考[J]. 管理现代化, 2023, 43(5): 1-9.
- [19] 王珂, 葛孟超, 罗珊珊.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N]. 人民日报, 2023-01-04(1).
- [20] SAMUELSON P A. Interaction between multiplier analysis and acceleration principle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39, 21(2): 75-78.
- [21] 闫芷毓, 袁宇菲, 薛熠. “挤入”还是“挤出”: 基础设施投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 世界经济, 2023, 46(7): 116-139.
- [22] 丁建勋, 罗润东. 新基建投资、原发式技术进步与我国居民消费扩容[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4(5): 102-111.
- [23] 李翀, 冯冠霖. 消费拉动和投资拉动: 产值增长模式之争[J]. 学术研究, 2023(7): 85-91+178.
- [24] 王蕴.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N]. 经济日报, 2023-02-15(10).
- [25] 赖立, 谭培文.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数字消费内蕴矛盾及其消解路径[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11): 28-36.
- [26] 李勇坚. 把扩大服务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N]. 中国经济时报, 2023-10-18(3).
- [27] 夏杰长, 刘佳昊, 刘奕. 服务零售促进消费潜能释放的政策建议[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3(9): 11-14+20.
- [28] 毛中根. 服务消费发展: 现状、比较及建议[J]. 人民论坛, 2023(18): 40-45.
- [29] 王政. 2000 万辆新能源汽车彰显创新力量[N]. 人民日报, 2023-07-05(2).
- [30] 夏杰长, 张雅俊. 充分发挥服务消费对扩大内需的牵引作用[J]. 中国税务, 2023(4): 36-38.
- [31] 周振. 以促进农村消费和投资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逻辑与方略[J]. 改革, 2023(3): 108-120.

Forming a Virtuous Circle in Which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Promote Each Other

XIA Jie-chang¹, ZHANG Ya-jun²

(1.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Summa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has been advancing rapidly, with economic growth being significantly driven by investment, forming an investment-led model. However, China's investment rate has long been high, far higher than the world average, showing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high investment, high savings, and low consumptio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the relative saturation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the driving effect of investment on the econom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limited, and th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driven mainly by export and investment is difficult to sustain. In this context,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propose that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should gradually transition from investment to consumption.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mostly discusses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separately, ignoring the clos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s the debate of "investment-driven or consumption-driven" patterns and clarifies the driving role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in economic growth. Secondly, it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Investment is a tool and way to meet consumer demand. Moderate growth of inve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investment structure can better meet the larger and higher level of consumer demand and promote the growth of consumption scale and consumption rate. Consumption is the purpose and driving force of production, and changes in scale and structure such as consumption expansion,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consumer demand will lead to changes in production and supply, and then affect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investment.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form a virtuous circle in which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promote each other. To fully unleash the potential of domestic demand, we need to form synergy to ensure stable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We need to enhance the basic role of consump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key role of investment in improving the supply structure. It is essential to turn to the mode of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relying on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form a virtuous circle in which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promote each other.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paper explains how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as two wheels, influence and promote each other to jointly drive economic growth, and discuss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forming a virtuous cycle in which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promote each other, which will help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It provides countermeasures for forming joint efforts to promote stable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Key words: consumption; investment; domestic demand; economic grow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刘欣琦, 徐雅雯)